

INQIANGWEIWENCONG

金蔷薇文丛 金蔷薇文丛 金蔷薇文丛

也无风雨也无晴

为了人生，我很动过一番感情。我所深领于心的，只有那些无功无果的悲欢喜乐。

——朱正琳



朱正琳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朱正琳 著

也无风雨也无晴

(皖)新登字 04 号

也无风雨也无晴(金蔷薇文丛)

朱正琳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铁四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6

印 张:6.375

插 页:2

字 数:140.000

版 次: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040—9/I·945

定 价:4.4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为了人生，我很动过一番感情。没遮没拦地活在这世上，恰又赶上过“峥嵘岁月”，自不免会有一些遭遇。所谓遭遇，就不完全是出自自己的选择。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原都不在筹划计算之中，当然也谈不上成败二字。我所深领于心的，只有那些无功无果的悲欢喜乐。一朝逝去，便不再留下任何痕迹。

“回首向未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我的记忆中绵延至今者，不过是几缕散乱的思索，干巴巴的，倒仿佛不是得自切身的经验。从这干巴巴思索中生 outcomes 些干巴巴的话语，拼凑起来，就成了这本集子。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也不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如鲠在喉的人，既发不出那样的“哼哼”，也打不出那样的“哈哈”。一吐为快而已，别无他意。

朱正琳

1992.6.11

目 录

自序.....	1
“放逐在自己家中”的生涯.....	1
生命的诗与入诗的生命	13
在爱与死之间	32
我在世界中	39
表演与观看之外	44
选择的必要(一)	48
选择的必要(二)	51
理由与借口	57
“说谎”辨析	65
“说谎”辨析(补)	70
评价、荣誉与观众.....	72
“自我形象”小议	75
Einmal ist Keinmal	79
漫谈“成功”	83
人生不可品	90
读书是私事	93
读《围城》多想了一点点	96
“学术轮回”“巨人肩上”及其他.....	100
言不及意说“自嘲”.....	102
有此一悟.....	105
“俺把你哄了”.....	108

说钱.....	110
捕捉光的游戏.....	113
表达无方.....	117
流行歌呼话人生.....	120
看哈贝马斯讲演.....	125
假如我中了 Lotto	128
还有精神.....	133
话说《三国演义》.....	138
不是痴人不说梦.....	143
“五香街”的性文化.....	147
无聊感从何而来.....	159
易北河畅想曲.....	185
读《100 个人的 10 年》随想	188
月夜乡情.....	193

“放逐自己在家中”的生涯

——读《鼠疫》随笔

“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1

一部《鼠疫》让我走进一个世界。这世界我并不陌生。

封闭的城市，人人等到的境遇，荒诞无稽而又真实无比的生活。这些，我都身在其中。我甚或还可以宣称：鼠疫与我同在！

尖锐的痛苦驱走了梦幻，阻遏了筹划与计算。我们被“当下此刻”牢牢抓住，失去了过去与未来。唯其如此，现实便不再有那种把捉不定的性质。它变得坚硬异常，既无法改变又无可逃避。有时我们会说它好像是一恶梦。但却是一场醒不过来的恶梦。所有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

信念都无助于我们逃离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真的，并且也不得不向着那些生存于澄明境界、因而视人世如幻影的神明们呼叫：“我也是真的！”

但是，如些鲜明生动的、独特的个人经验却无从表达，我们只能用同样的词句诉说与别人同样的痛苦，最后当然是大家都只得缄默不语。不止于此，我们还必须按照同样的规则行事，没有一个人有权说：“我的情况特殊。”因为事实上也并不特殊。不错，鼠疫当头，人便成了“抽象观念”。死是“抽象的”，生活也是“抽象的”。一旦我们要维护“个人幸福”，就得与“抽象观念”展开斗争；一旦我们要与“抽象观念”斗争，就不能不按抽象的原则办事。鼠疫成了一种“大道理”，说者生厌，听者伤心，但最终人人都须服从它。

这样，我们以不可代偿的个人痛苦所赢得的真实却又被“抽象观念”囚禁起来，我们自己则遭到了放逐。而且，用加缪的话说，我们恰恰是“放逐在自己家中”。“封闭的城市”反倒使我们犹如流放在“外”；“等同的处境”却造成了人与人的隔绝。一方面我们焦虑万分，另一方面我们又百无聊赖。……

这，就是我的世界么？

我不曾指望过“得救”，而只想在这个世界中寻访我的同类。……

2

那个患哮喘病的老儿，足不出户，日复一日地在家中数鹰嘴豆，从一只锅数进另一只锅。当全城的人都在为鼠疫惶惶不安时，他却依然故我，丝毫不为所动。看起来，他似乎超

然于鼠疫之外。

那么，是什么支持他？回答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是习惯。

实际上，对于我们不得超渡的生涯来说，习惯也许是一种最常见、最简便的支持物。习惯者，习之以为常也。没有任何根据也不需要任何根据，因为习惯本身似乎就是根据。有谁会问，你为什么偏偏有这种而不是那种习惯呢？我们更多听到的倒是这样一种回答：我为什么那样？——因为那是我的习惯。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或建立某些习惯，以此应付我们那失却要抵而又受到威胁的人生。只是很少人能像数鹰嘴豆的老头那般彻底。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很难像他那样对自己的习惯全神贯注。——哪怕你天塌东北、地陷西南，我照数我的鹰嘴豆不误。一般说来，我们总是彷徨于无所期待和有所期待之间。习惯之不易打破，往往是由于我们不愿打破。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它，因为它是我们佯装着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凭靠。我们害怕失去它，因此我们宁愿无所期待地活着。但是，我们的内心其实逃不过也耐不住无聊的侵袭，每每便于潜意识深处生出某种期待来。不敢期待超升，就暗自渴望变化，虽然当那变化果真实现之日，我们就发现我们所期待者往往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者。唯因我们有所期待，我们的习惯就很脆弱，经不起什么冲击，而惶惑就成我们心中逐不走的常客。

数豆老头却有些不同。他一方面似乎对自己的习惯倾注了全部热情（数豆好像是世界上头等大事），另一方面他对其它的事则一概应之以淡漠。这两者显然是相辅相成的，但何为因，何者为果我却不甚了然。有一点倒很明确：他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习惯中了！“鼠疫是怎么回事呢？鼠疫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这是他说的话了。生活之于他，也许

没有比数鹰嘴豆更重要得事了？是大智若愚呢，还是“大愚若智”？不管怎么说，他的封闭习惯使他得以在鼠疫面前保持了超然的态度。

其实，作为“习惯”，数鹰嘴豆并不比其它种类的习惯更可笑或更无价值。关键的问题是在于：真有这种颠扑不破的习惯么？数豆老头的淡漠仿佛也引发了鼠疫的淡漠；鼠疫竟然没有光顾他。是他习惯太强大了，连鼠疫也莫奈其何，抑或只是他的运气比较好，侥幸过了这一关？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他身染鼠疫（这是不可能的！），数豆的习惯就必须放弃。他将被强拖出户、隔离治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保持他的超然、平静或淡漠么？当疾病、痛苦与死亡不是直接涉及自己时，我们能找到许多的避难所：哲学、宗教、诗、教养和习惯等等。可是一旦成为亲身遭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背后实则是空空如也，无可凭靠。只须想一想肉体的痛苦，那就是我们永远无法漠视的。

所以可以说，数豆老头的“习惯”也和我们一样脆弱。所不同者，是他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护它。他的封闭自己，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他知道而且害怕自己的软弱。他的淡漠，也同样是对自己的保护。事实上，当成群的老鼠死在街头时，他也曾情不自禁地大喊：“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带着老年人兴致勃勃的神情。也就是说，他也曾像我们大家一样悄悄地期待着什么。一阵兴奋之后，他又复归平静，看来鼠疫对于他并不新鲜。更重要的是，依靠一种自我封闭，他在一个封闭的城市中依然能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除非鼠疫直接侵入了他那一块封闭的小领地。说到底，他对待鼠疫的办法是逃避。他的堡垒是习惯，绝非坚不可摧，但确实不见得比哲学、宗教或诗给我们营造的避难所更易攻破。

习惯，一种情性，其中似乎也包含着某种智慧。这智慧

就在于：习惯的养成无须乎求助于“第一原理”。它好似我们细心培养起来的一株无根的植物，于不知不觉中竟生长成荫。其实，不用多想就能明白，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无外乎就是使我们养成种种习惯。老人们都很清楚，如果你不急于一次所谓“大喜欢”或“大悲哀”中就与神合一（也就是你不急于想死）的话，习惯和金钱一样至关重要。事实上，在我们“沉沦”无助的生涯中，有谁没有接受过习惯所给予的悄无声息的支持？

但是，习惯终不过是一种防御手段。我们都在数着鹰嘴豆，淡漠的后面却掩藏着惶恐。——我们害怕受到伤害。会受到伤害的显然不是习惯本身。那又是什么呢？

我翻到了另一页。

3

朗贝尔是一个外籍记者，鼠疫把他困在“我的世界”。他觉得自己的情况“特殊”，鼠疫按道理说与他本无任何关系。所以，离开这个世界在他是最自然不过的，最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任何人也不理会他的这种“特殊要求”。里厄医生对他说：“矣，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这儿的人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法同意。他的“个人幸福”乃在另一个国度（那里有他的未婚妻），他怎能甘于在这里沦为“抽象观念”？因此，为逃离鼠疫他竭尽全力。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却突然改变了全部看法：放弃了“逃离”而加入了“抗争”。从此，他的躁动消失，变成了某种平静。

这几乎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我们可以说，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承认他已是“这里的人”，因为他爱上了这片鼠疫

流行的土地。什么是爱呢？爱便是一种纠缠，你很难把它理清，也很难把它斩断。与习惯一样，这种纠缠也没有什么根据，它自身就是根据。朗贝尔的爱不是“神圣的爱”，它与信念没什么关系。那也不是“理智的爱”，其中并没有蕴含着什么原则。朗贝尔有的只是一种认同感，差不多要称为“乡土之情”。这种感情，平日很难觉察，只是你准备撒手而去时，它就开始在你心里纠缠。这不单纯是一种留恋，更多地倒是怅然若有所失。

朗贝尔能失去什么呢？对于这个世界，他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么？

然而，我们谁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客人，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在这一点上，朗贝尔也决无二致。无论我们来自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一个假设的世界，我们所来到的这个世界都不可能仅仅是采访对象。一个受鼠疫围困的人，如何得以固守“外来记者”的身份？朗贝尔一心出逃的全部活动，不折不扣地已经是“这里的人”的行为，只不过他在开初没有意识到而已。鼠疫的确抹平了人为设置的各种区分，再没有人能够说他只是在这里“体验生活”。关键是你已在这里，不管你认为这有多偶然或多荒唐。

我已在此，我即“此在”。朗贝尔终于明白，他实际上已无可脱逃。一旦他“回”到他原先所来的世界，他就会发觉他已经把自己遗弃在这里。于是，朗贝尔只好在两种“失落”之间进行选择。——“选择”从来就别无它义。我们总得横下一条心，把一种失落隐忍。朗贝尔的选择并非“理当如此”，也即是说，那不是用“正确”或是“错误”可以判断的。当然也可以作出令朗贝尔自己啼笑皆非的解释，把他的选择说成是一种英雄之举：牺牲个人幸福以抗拒恶势力（鼠疫）。但是，同样令朗贝尔啼笑皆非的相反解释也能成立：他的行为

其实很自私，只图自己高尚而牺牲他人（比如其未婚妻）的幸福。要之，一旦进行选择，牺牲总是存在的。不过，这只是出自人的困境，并没有那许悲壮的意义。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他作出了何种选择，而在于他何以会需要选择。如前所述，这证明他所设置的对象世界已经他的生活本身，成了他的存在。有了生活，也就有了爱（爱其实是消解了对象的！）。如果我们不夸张爱的意义（也就是不吹嘘它的神圣来源和伟大力量），它的确也是我们放逐生涯中的一种支持物，虽然它与习惯同样地脆弱。

对此，里厄医生的母亲提供了另一个更为明白的例子。她是一个母亲，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因而，自有其普通人的智慧。当死鼠出现时，她说：“这类事情是有的。”其平静有甚于那个患哮喘的老头儿。她的智慧，是一种清明的常识。可以说，她同样把鼠疫看作“不过是生活罢了”，但是，她没有把自己封闭在某种习惯之中，没有对鼠疫和生活持淡漠态度。她关切她那与鼠疫作斗争的儿子、关切他的朋友和病人。为什么？因为她爱自己的儿子、爱他的朋友，同情他的病人。然而，诚如里厄医生所想：“爱一个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的。”因此，他俩除默默地相爱以外，顶多只能在片言只语和一些琐琐碎碎的举动中揣测到对方的心。这与大仁大义、大慈大悲的情怀当然差很远！确实，没有比爱更为平凡、更为柔弱的了！两个相爱的人，如果其中之一患了鼠疫，另一个人能为他（或她）做些什么呢？在这种背景下来谈论爱，我们只能说它无非是彼此的关注而已。

这一点关注，这一点爱心，无从表白更无可夸耀。它是生命的依托，又恰恰是最需要保护的生命本身。如果说习惯是我们为生存小心拼凑而成的甲冑，爱心则是这生存的肉

躯。一旦袒露在外,就很难不受到伤害。因此,我们总是层层包裹,采取了种种防御手段。习惯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其它的还诸如教养、宗教、哲学以及诗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我们的防御每每又反过来窒息了爱心,这也许是人所持有的一种迷失。“遇穷途大哭而返,”正是这一寸悸动的柔心使我们倍感生之寂寞。它的受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它自身、从它的创口处直接生出一种世俗的智慧(清明的常识),这也许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智慧,饶赦了不可避免的罪恶,容忍了与生俱来的苦难,不再把它们视为生命的入侵者。可以说,这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但能明白自己的无可奈何自然已堪称智慧。因此,这种智慧固然消极(什么智慧不是消极的?),但却使我们得以摆脱焦虑和沮丧。我们用一种原始的冥顽承受了全部伤痛,并且就在此冥顽中平复痊愈,虽然免不了会留下疤痕。“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或许是普通人的智慧?当然,我们终与自己的寂寞照面,在这寂寞的深处,是不是潜藏着生命的根?

有必要作一点区分,即:俗人的智慧不同于浪漫主义者的激情,它不会去歌颂痛苦。与此同时,俗人的爱心也有别浪漫主义者歌颂的“爱情”,它没有把自己高扬在生活之上。总而言之,俗人的智慧与爱心都只有在沼泽地里打滚,没有那许多的美学意义。实际上,它们几乎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表达:一旦被表达,就已经被拔“高”,失去了“俗”性。是的,在俗人眼里,爱是没有来由的,痛苦是没有来由的,这和生命一样,没有必要去追问;同样,爱没什么了不起,痛苦没什么了不起,这也和生命一样,不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我终究意难平。

在我的世界里,爱心只能招来寂寞,智慧只能导致容忍么?

我不能停在这一页上。

4

塔鲁可算得是一个怪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要么是谋杀者，要么是受害者，舍此别无选择。他不能容忍谋杀，尤其是在抽象的正义观念名义下所进行的堂而皇之的谋杀。——谁有权去判别人的刑？所以他起而反对谋杀。结果却发现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谋杀——对谋杀者的谋杀同样是谋杀；以恶抗恶终究也是恶。于是他便选择了另一种立场：让自己始终站在受害者一边，以帮助他人来求得内心的安宁。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谋杀者与受害者并非泾渭分明。一个谋杀者，往往同时是一个（自觉与不自觉的）受害者；一个受害者，也往往同时是一个（自觉与不自觉的）谋杀者。因此，在帮助一个“受害者”时，你怎么不是同时在助纣为虐？

塔鲁的困难乃在于：当他反对依据抽象的正义观念（他认为这观念完全是无稽之谈）把人（具体、实在、有生命的个人）裁判为抽象的“罪犯”而予以惩处时，他自己则只能去帮助抽象的“受害者”。法官和检察官尚能自以为有所依据（他们只对抽象观念负责），塔鲁则深知自己无所依据（他从根本上不能赞同把人看作任何抽象观念）。使他震动和不得安宁的是生命受到伤害的具体过程，他惊异人们何以会对那种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何以会用一个名称便证明了那种事实的合理性（这是“死刑”，那是“鼠疫”等等）。但是，一旦他决定不再消极地容忍这一切，而企图有所为时，却发现自己总是依据了某种抽象观念，也就是把人视为某种抽象

观念，否则便寸步难行。以正义的名义执行的死刑和以鼠疫的名义采取的隔离，两者都损害了个人幸福，又都有同一个抽象的依据：为了多数人的幸福。

当然，差别还是存在的：前者是惩罚，后者是救助；前者不考虑死囚的个人幸福，后者则从“大道理”上说还是考虑了病人的个人幸福。也许正因为如此，塔鲁选择了后者，但是，如果明知所有被隔离了的鼠疫患者都无一例外地不可治愈，那么，他（或她）那所谓被考虑了的“个人幸福”也就同样是一个空洞的抽象。而且，如果要从“大道理”上说，人们同样可以论证“死刑”也是为死刑囚徒个人考虑（惩罚即拯救），因为“大道理”是不以死亡为终结的。这样的“大道理”我们还听得少么？所有的大道理都会声称它最终考虑的是“个人幸福”，但是，所有的大道理都漠视现实的个人痛苦。这恰恰是“个人幸福”、与“抽象观念”冲突的焦点之所在。

塔鲁不得安宁，他逃不脱“大道理”。种种抽象观念交织成一个世界，直至把人和生命都织了进去。我们不仅与这个世界相安无事，而且似乎把它当作唯一坚实可靠的大地，处处依赖于它。事实上，我们几乎已无力面对具体的生存，不将它还原为抽象观念就会手足无措。因此，我们每每把这个用抽象观念织就的世界称为“人的世界”，似乎它才是我们唯一真正的生存之所在地。这种称谓绝非完全虚妄，塔鲁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大道理”就是一个证明。换句话说，成为“抽象观念”，乃是人的本质，是人不可避免的存在的方式。因此，只要你不愿仅仅以“消极的智慧”守着“寂寞的爱心”度日，就必然要进入这个“人的世界”，参与“抽象观念”相互之间的纠缠与斗争。这个“人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技术世界”。所谓“技术”，不正是一种抽象能力？它是俗人唯一可用以进取的手段。其进取的目标则是“功利”，也即是

可以计量的“幸福”(这当然又是一个抽象观念!)

然而，在塔鲁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向往”。他明白，那不是植根于任何抽象观念。而且也不能实现为任何抽象观念。他似乎必须超出这个世界，但又只能在这个世界中挣扎。所以“他从来也没有在希望中生活过”。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如愿以偿。但他仍然在不断地寻求通往安宁之路，就好像要在这世界中寻求某种缝隙。在“谋杀者”与“受害者”之间他终日彷徨，想找到另一种形象。他说：“应该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事实上，人们遇到真正的医生很少，而且可能也很难遇到。”那么，他是不是在里厄医生身上发现了什么？

里厄医生不像塔鲁想象得那么复杂，他的内心中也没纠缠着那么多的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有超出这个世界的冲动。在他看来，疾病总是应该治疗的，死亡总是应该加以对抗的，而这恰恰正是他的“本职工作”。他说：“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因此，他“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鼠疫当前，他几乎是没有犹豫地就选择了“抗争”，放弃了“个人幸福”(他的妻子也在外地养病)。但他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什么了不得的道理，至少是觉得自己没法判断这种选择的好与坏。所以，当朗贝尔告诉他决定留下不走时，他感到的是对朗贝尔的决定不甚清楚。他对朗贝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总而言之，里厄医生不是一个英雄，他的行为不是出于某种所谓“崇高的理想”。他也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不能相信死亡与疾病(以及它们所造成的痛苦)乃是上帝的恩